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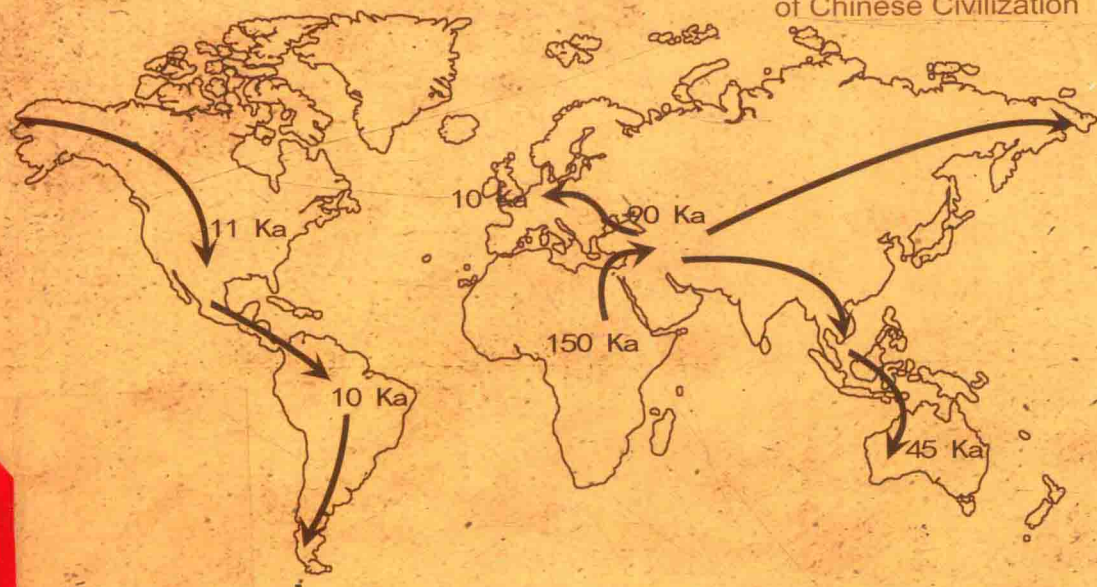
基因揭示全球文明同源及中国文明起源之秘

新文明简史

A NEW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苏三◎著

Genetic
Revelation
of Global Cultural Diffusion
and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全球文明同源及东亚文明起源之秘

新文明简史

A New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Genetic Revelation of Global Cultural Diffusion and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苏三 著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文明简史 / 苏三著.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151-0584-0

I. ①新… II. ①苏… III. ①世界史—文化史

IV.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2299 号

新文明简史

作 者	苏三
责 任 编 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1-0584-0
定 价	68.00 元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 子 邮 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 律 顾 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序]

接受苏三 检点文明 省思自我

许 宏

要先说说这序的由来。

三年前的2010年，我发过一篇博文《接受苏三：一个“体制内”学者的认识论》。由于对苏三女士的评价一以贯之，这篇短文仍代表我的想法：

苏三，北京文化学者，以非史学专业出身而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主张“全球文明同源”论著称，因奇思与新论迭出而饱受争议。其人其书，已被坊间誉为奇人奇书。

知道苏三的《汉字起源新解》（东方出版社，2010年）已有一段时间了，买到书又有一段时间了。

.....

昨夜今晨忙里偷闲，带着“批判”的眼光耐着性子捧读，不想一气儿看了几十页，到该上班时脑海里已有了读书心得的题目：接受苏三！

我应当属于作者说的那种在“‘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固定模式”下成长起来的“体制内”学者，可以肯定地说无法完全接受她的研究结论甚至某些推论方法。但我首先接受的是她的认识论。

苏三坦率地承认自己的论断是“推测”“设想”“假说”，用“可能”“很可能”来修饰自己的结论，而不像我们业界某些学者常用“正确”“真理”“科学”来评价己说，同时用“错误”、“谬误”和“不科学”来评价反方。因而我认可她在《后记》中对自己的评价：“我一直认为，我是非常‘严谨’而‘科学’

的”，认可她的科学观。

……有关史前与原史（proto-history）时代的诸多研究课题，其结论具有不可验证性。只要你自圆其说，概念和推论过程周延，就可以成立。因此，我们不能轻易地指责某种观点为“妄说”，关键是看它是否能被“圆”起来。

就重证据的考古人而言，苏三女士的研究中当然还有不少欠“圆”的地方，但苏三对中国文明存在的问题或曰某些特质的剖析一针见血，对我们“体制内”学者的某些评价也相当尖锐。但在我看来，“苦口”的往往是“良药”。

作者说：“有些‘常识’其实就是认识真理的障碍。”（10页）

作者还说：“我们今天首先需要做的，是开放思想，解放思想，而非别的。”（73页）

这些都是我非常赞成的。

其实，我们这代学者已感受不到多少“‘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固定模式带来的前提性压力”（15页），现在的学术环境已足够宽松，我们已抱着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多维视域的研究，认为各种推想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都是不能被轻易排除或否定的。

日前与苏三女士又在微博上“相逢”，也算是缘分。她同样以“欣赏加批判”的眼光读我的《最早的中国》等，继而有所交锋讨论。提起来，她居然还没读过我的这篇博文，因而也就把她遭我们“体制内”学界冷遇的心情和她坚忍的“有色眼镜”带（戴）进了2013年。苏三女士在微刊中转发这篇博文时感叹到：“对于我个人，对于西来说的际遇，这可能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按苏三女士的话，我的“接受”让她开始重新认识学界的人。其实，所谓学界原本就不是铁板一块，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声音，而本人的“理解”也代表不了哪个群体，在学界，我可能还算是个“异类”。所以，我可以在三年前就“接受苏三”，而且至今不渝。我的看法也只代表我自己。

之所以有底气写这个序，是因为有这样的自信：我大概不是唯一也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上古史、考古学界真正从头到尾读过苏三女士几本书（《汉字起源新解》、《落后》（后更名《文明大趋势》，下同）、《新文明简史》）的人。显然，这是评价一位作者及其作品的初步前提。

苏三女士对其研究的自我定位，见于《落后》一书的跋中：“以往读者常把我的研究归类为‘考古’‘历史学’‘语言学’‘传播学’‘人类学’、等等，不一而足。但我始终觉得都不能十分完好地涵盖，根据我的随意方式我也只将我的

文字总结为“文化呼吁”。现在我想，假如一定要把我的研究归类的话，它可能属于一个不知是否已建立的新学科：文明学。”在本书的自序中她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我不是研究历史的，因为这本书几乎完全是对地球之上历史之前的人类发展的探寻，假如你想说那叫史前史，我还是想强调我在探讨人类文明起源，甚至是研究文明学，所以这本书就被特别命名为《新文明简史》了”。

但在我看来，苏三女士的书虽具有“文化呼吁”的特性，有理论高度但并不局限于理论探讨和逻辑推导，而是涉及大量跨学科的具体材料分析，注重“时空之流”的立体变化，其实完全可以归于大历史视角下的“全球史”（中国学科分类中的“世界史”实际上是外国史，所以我们在此不用该词）研究的范畴。书名中的“史”字，更是明证。

将其仍归于“史”部，像我这样“史圈”内的学者也才有了点发言权。

史前史的研究应该允许想象，且必须是多学科整合的。考古学的研究和苏三女士的由逻辑思维入手的研究，构成了这个领域研究的两极。如果说考古人重遗存，关注“有”，那么苏三女士着眼的是文明的发展应该是怎样的。考古学材料的物质性和破碎性，决定了这个学科在史前史研究中极大的局限性。狭隘的“科学观”和既有常识阻碍创新思维的倾向也值得警醒。如果说苏三女士的关注面过于广大、思维过于活跃，待“凿实”的细节问题还有很多，那么我们业内人士的视野可能过于狭窄、思维过于不活跃，所以或有坐井观天、就事论事、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之嫌。我在微博讨论中曾有“苏可神思飞扬，许必脚踏实地”的断语，大体上反映了这两种研究思路的差异。

苏三女士面对着种种质疑诘难，曾抨击过中国学界对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说的执着与偏狭，现在她意识到这本不是考古人的问题，或许没有全球视野的微观研究只能得出类似的结论。她指出，“源”其实分微观中的源（如中国之内）和宏观上的源（整个亚洲乃至整个旧大陆），而宏观意义上的探源要交给其他学科，必须要有全球视野的历史学人提供假设与思想，考古人再去论证。其实，在中国，考古人本来就是历史学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本来只是在研究材料、方法与手段上与文献史学家有所不同，研究目的则是一致的。只是，相当一部分考古人的工作局限于考古资料的发掘与梳理，实际上我们应该而且可以把自己的成果升华到“大历史”或“大文明”的层面。但我们在这个领域缺位了，苏三女士则勉为其难、当仁不让地担当了起来。

日前与一位年轻朋友聊起苏三，那位同学表示苏三的观点他其实是认可的，

只是情感上有些难以接受。我的回答是：那就要反思我们自己了。我在一次访谈中曾经有过如下表述：与世界上其他原生文明发祥地不同，中国考古学在诞生伊始，就以本国学者而非西方学者为研究的主力。中国考古学家与其研究对象间的亲缘关系，决定了他们的探索具有通过考古学这一现代学问“寻根问祖”的性质。……不能否认，在这种学术的“寻根问祖”中，有些学者的研究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民族感情色彩，摇摆于建构认同和追求真实之间。如何把握其与“无征不信”的现代学术准则的关系，是需要加以严肃思考的问题（许宏：《发掘最早的“中国”》，《三十年三十人之激扬文字（思想社会卷）》，中信出版社，2008年）。

苏三女士的外语系出身，受过宏观经济学的理科培训，使她获得了广泛阅读材料的便利和理性逻辑思维的优势；非史学专业出身，又使她的思维不受既有知识框架的限制和束缚。因而，她的思考是冷峻的，视野则极为开阔。这与本土上古史和考古学者的研究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作为这些研究之结论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和“全球文明同源说”，也大大刺激了国人的神经，作者曾备受责难与诟病，除了学术规范问题外，主要的恐怕还是情感因素。为什么我们的文明不能是受外来文明影响而出现的甚至是外来的？为什么中国古代文明一定要土生土长、“自力更生”才能让我们感到踏实快慰，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为什么笔者提出“最早的中国”的出现不早于公元前2000年，就会使某些同胞感到不适甚至自尊心大大受挫？说到底恐怕还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我关于夏文化的一句老话可能具有普适性：就现有材料而言，我们还不能轻易排除或否定任何一种假说提供的可能性（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苏三女士作为中国学者，能够在探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从西方看东方，不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吗？作为文化学者，自由思考，求真逐理，为什么不能被接受呢？这也就是我接受苏三的思想基础。

最后，我想谈谈对整体史或“大历史”观的呼吁。就人文学科而言，随着信息爆炸和科研体制的束缚，研究者逐渐被拘束于狭窄的学科甚至具体研究方向内，“螺蛳壳里做道场”，使我们的研究越来越具匠气、越来越碎片化。陈寅恪先生在20世纪初就曾批评当时的中国学界道：“国人治学，罕具通识”（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1930年）。即便在当下，这种状况仍未能改变甚至还日趋严重。鉴于此，整体史意识和“大历史”观的确立，有助于消解“碎片化”倾向的负面影响，应是值得呼

吁和提倡的（许宏：《草木留荫芳华沁人——缅怀徐苹芳先生》，《文物》2011年第9期）。

在前文中我曾提及苏三女士的研究可以归于大历史视角下的“全球史”。而“全球史的特点就是联系，‘联系’是最能体现全球史研究特色的一个词汇。它既承认地区性和独特性，同时也能唤起人们对宏观模式的关注”（Patrick Manning, *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在上引书《全球史导航：历史学家创造世界历史》中，作者帕特里克·曼宁教授还指出，全球史学者应广泛利用各种材料作为史料，也应不断转换于各种视角和思路之间。这虽然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地重复研究，但也让我们能更好地去核实一个结论，以免因为“近视”而得出肤浅、苍白和片面的解释……就培养一个世界公民的伦理意识而言，全球史的重要性也绝不亚于民族国家史……（它）让我们转变传统的时间观和空间观的视角，值得我们在它的探索道路上不断前行（田婧：《评曼宁〈全球史导航〉》，《全球史评论》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我想，苏三女士的《新文明简史》已经在践行这样的理念，上述论述用于对这本书的评价，是不为过的。

苏三女士的书中不乏前瞻性的研究，譬如她预见到基因学的发展，有可能给史前史的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冲击，作者在书中对其做了充分的阐发。类似的前沿研究，可能暂时还未被学界和文化人所认可接受，我们对关于基因和神话对应关系的推测就抱持审慎的态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解释是无法被验证的。当然，在考古遗存与民族志的和实验的材料之间建立的联系越多，解释就越可信，通向古代的桥梁也就越坚固，反之则不然”（陈星灿：《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读书》1996年第12期）。一切的深入探索都有待于各学科材料间联系的不断增多。

今天或许不是评价苏三女士研究的最好时机，但我们相信时间、历史、学术是公正的，未来会给她的研究做出公正的评价。

还是用作者的一句话作为收束吧：

“在历史领域里，其实每日都有创新与发现，只是缺乏创新的思维与眼光罢了”（《自序》）。

2013年7月17日于北京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

自序

近十年来，我从一个全新角度研究文明起源问题，已初步构建出一套新的逻辑体系。这套系统，从我先后出过的九本书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发展、形成的过程。而《新文明简史》是第十本书，也是我十几年来研究成果的总结。想来，应该为不熟悉我的读者写点说明——熟悉我的读者朋友可以直接跳过去。

上篇 一个外语系人的呓语

一、我不是历史研究者

我是外语系出身，我没有史学背景。另外，我也不认为我是历史研究者——起码不是一般人们熟知的那种历史学者。因为，即便本书也几乎完全是对“历史”之前的人类发展的探寻。假如你想称之为“史前史”，我还是想强调：我在探讨的是“人类文明的起源”；我也不是在泛泛地做史前研究——我的工作其实可以归结为“文明学”^①，就文明探源方面切入更深。

历史学着眼于时间的序列，可以无所不包；但文明学却只是注重文明主流的定义、起源、发展及其传播规律的研究等，一切都紧紧围绕文明本身进行。尽管文明学确实与历史学有交集，但目的与任务却明显不同，其差别之大几如数学与物理学。

^① 我在《文明大趋势》（中国商业出版社，2014年1月）中第一次提到我与“文明学”的关联，当然这作为一个名词不是我第一次提出，但目前“文明学”尚未成熟是个明显的事实，希望以我自己的研究为之贡献绵薄之力。

其实更多人认为我是研究考古的，这也不对。这个“误解”依然是由于我过多涉及“文明起源”问题，需要借助于考古学的一些方法和成果而引起的。其实考古学在我的研究中所占比重并没有那么大，尤其是“中国考古”的比重不会很大。这是因为我实际研究的是“全球文明起源”，当然这也包含了“中国文明起源”；总体而言，中外考古加起来所占比重大约为 50%:50%；其他支撑该项研究的领域更多涉及文化人类学、交通学、古气候学、古地理学、分子人类学、海洋学、语言文字学、神话学，但最为关键的可能是对中国文化与文明的整体把握，包括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现状的评估，我认为这才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认识。为何要区分这些？这可能对于理解我的研究更方便。这个区分使得围绕我的问题会豁然开朗。

首先我认为，仅仅依靠考古学是不可能建立健全文明起源与文明发展研究体系的。这还导向另外一个问题：为何我一个赤手空拳的“外行”，可以与实力雄厚的中国考古界对峙十年？2014 年春节前后支持我的读者明显增多。我坚信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我，而非坚持“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中国考古界。我认为中国考古界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单只是依靠考古学成果和方法解释文明起源，是有先天性缺陷的。换句话说，在研究文明起源这个问题上，我的“专业问题”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原先有人以为我是 100% 的外行，假如换个角度从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视角来看，在文明起源研究中我可能比有些考古人更有“专业”优势。

经常有一些名头很大的中国考古专家倨傲地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这里面甚至包括某些海外华裔专家，他们理应眼界开阔、“专业”过硬，可是我发现他们提出的许多有关文明起源的问题，既幼稚又可笑，可以说他们连起码的研究门道都没入——而这恰恰是他们通常对我的看法。为何如此？因为我所研究的文明起源领域，可能早已不属于考古人的学科范畴——尽管他们认为研究文明起源一直是他们的“蛋糕”。习惯以实物为依据的中国考古人，近几十年来在既定的“中国文明独立起源”框架下，沉浸在比对中国国内文物的序列中；我所研究的领域是则是在完全开放条件下的全球文明比对，而且，依据出土文物之外的诸多逻辑推理在我的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就是我们的主要差别。在诸多方面我却完全打破了他们的行规和戒律，所以谁是守旧的谁是创新的一目了然。

我和国内考古界大多数人的思维、手段、方法与研究目的完全不同。由于已在这个领域研究十年，我所掌握的资料也不再是他们所掌握的实物资料所能涵盖

的，双方的信息最终也不对称起来。最终，我们成为几乎完全不能对话的两种人。在这一情况之下，双方的不解难免也会转化为戾气。越来越多的分歧与争议表明，我们的争议并不真正在“学术”，而是在思想，在视野，甚至在史学之外。

在尖锐的对立中，我那常常被讥讽和谩骂所损耗掉的理智也告诉我：必须将这两个学科分开，可能才是将文明起源研究引入正途的一条出路。文明学不是考古学所能涵盖的，起码文明起源研究不是中国考古学界可以一手遮天的。

二、重新研究文明起源的必要性

史前史的研究看似距离今天非常遥远，但实际上与现实密切相关。从某个角度而言，只有弄清了我们从哪里来，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所以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战略研究重要的一环。

之前中国知识界对中国文明与社会的研究，我认为一直停留在表面，问题就出在没有人深挖根本。或许应该说“根”被中国考古人给挖过了，但我认为他们挖掘得不够深，方向也不对，反而把真相给淹没得更深。所以我这个“外（语系）人”被迫自己亲自来挖，他们许多人的能力与职业道德受到我的怀疑。我坚信我能挖出新东西，因为我之前已经判断了他们属于“旧人”。他们眼光是旧的，思想是旧的，所以他们也不可能看出“新”来。而我无论从哪方面都是一个“新”人。2005年一个留学归国的三联编辑邀约我写一本历史方面的书，我问她为何找我，她说：“任何事情只要经你嘴说出来都一定会有格外的新意。”我知道这个“新”其实是一种“异”，那是一个“外（语系）人”与中国传统社会摩擦时流下的血泪所沉淀的晶体。我也坚信我也能在文明起源中看出“新”来。

那么，“文明起源研究”本身从学术与思想上究竟涉及哪些重要问题呢？

从大处看，它涉及自古以来人类永不停歇的终极追问：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谁？任何人都希望知道这些谜底。此外，这个研究能够顺便梳理“李约瑟难题”，即“为何中国科学在近代走向落后”的问题，答案就在拙著《文明大趋势》与本书中。由于在我的框架中，“李约瑟难题”是个明显的伪命题，所以我就没有直接对其加以评论。甚至在人类学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提出的“耶利难题”（为何各个民族如此不同，有的那么发达，有的却依然停留在原始社会？），我相信也可以在本书中得到更好的解答。

有个读者在阅读完拙著《文明大趋势》后，曾经惊喜地对我说，我的书几乎解答了他一生的所有重大疑问，他对我研究工作的总结是：“伟大”。在新的文明

构架体系下，以这两本拙著为主要框架，我可能确实提供了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苏三的答案”。我的研究远非完美，非常粗糙而且“不专业”，但它还是说服了许多读者。该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涵盖了20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热切渴望解答的诸多问题，同时也满足了人们最基本的知识需求。

中国社会今天处于一个巨变时代，人们更加急迫地需要对中国文明的深层问题有一个清晰的答案。本来与其他中国人一样，我对这个社会与时代也曾经迷茫彷徨，但通过这几年的研究，我逐渐找到了那些困惑自己的答案。这其实也是我的原始研究动机——为我自己的人生与所处的社会思考问题。

三、围绕中国是否落后的痛苦批判

从年轻时我就是个激烈批判社会的人，后期转入了文明起源的研究。表面上看，我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对社会温和起来，明显从“愤青”变成了温吞的学者。实际上，我可能正在潜入深层进行更为彻底而酷烈的釜底抽薪式批判。

20世纪人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批判，似乎更多集中在国民性的解析方面，我也很热衷于此。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对“国民”（人民）的批判。我认为仅“批判政府”是不管用的，因为政府来自“人民”，“人民”不改变一切都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今天我更加坚定了这种看法。具体到这项研究上的怪异，我也并不想过多指责中国的史学界或“考古人”，因为他们就是“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整体有多落后，他们就有多落后，一切是同步的。看似这是批评，但这其实也是免责。中国知识界实际上与中国政府是一体的，所以我更多的批评其实也是直指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但最终指向其实是对中华文明的再认识，这在转型期间是必须做的一项工作。

免责或苛责只是一种态度，对于社会发展并无实质意义。为何中国社会如此落后，才是需要研究解决的真问题，所以“批判”才会转为“研究”。只有研究之后，批判才深刻，才更有力量。文明起源的研究，在我看来正是属于一个如此重要的“现实问题”，它不是一个与我们今天毫无关联的问题。没有这项研究，对于中国文明就不会有一个宏观的方向把握。

我对于“中国为何落后”这个问题，思考的结论是令人悲伤的。而且，这个结论是逐渐浮出水面的——也就是说，它是逐渐研究得出的结果。以前我只会对中国这方面不满那方面不满，但在2011年前后交稿的《落后》（即《文明大趋

中》)中,我已经隐约意识到了中国深层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的落后并非是近现代的问题。但当时对于更深层我尚未真正触及,因为我一般的研究只止于新石器时代,一般人们都不太会想到旧石器时代。但我突然想,既然要挖,这次我要挖到底。我决心要一直挖到万年以上的旧石器时代,看看究竟中国与西部旧大陆的差距到底有多远、多深,来个一次性解决。这就有了《新文明简史》这本书,这样两书合起来就把中国文明发展进行了时间上的全覆盖,不过遗憾的是他们体例不一。这项探索的结果使我大吃一惊:远非我之前想象,东亚地区的落后不只是在文明起源的新石器时代,而是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也就是说,中国的落后现状,很可能是近几万年的积累!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一个事实。

在震惊之余,我不得不承认这个自己不愿意面对的残酷事实:东亚这个文明体系,其文明层次远远低于中国人自己的评价。之前我们的诸多历史骄傲感都建立在一种虚妄之上,许多有关中国的历史概念都是自欺欺人的骗局。在几大文明板块中,综合考察各种因素,自古东亚文明仅只高于美洲土著文明与大洋洲文明(甚至在现代人出非洲的旧石器时代东亚也是落后于澳洲的,这一影响的直接后果是,澳洲的原始岩画特别发达,中国地区根本与之不能相提并论);在历史时期东亚确实加快了步伐,甚至逐渐超越了非洲大部地区,并且更远地甩开了大洋洲、美洲文明发展,除此之外,东亚似乎就没有什么其他格外的骄人成绩了。无论在文明起源阶段还是现代化阶段,东亚地区的文明层次都远远低于西部旧大陆地区,甚至不高于印度地区(但也更接近印度地区,而非接近其后的美洲文明)。

从大约一百年前开始,中国人就一直把“四大文明古国”挂在嘴边,成为中国人骄傲的资本,但实际上这个划分是根本不科学的。中国勉强列为“第四大文明板块”还是可以的,但不要忘记美洲文明也可以称呼自己为“第五大文明”。“四大文明古国”与“第四大文明体”之间似乎差别不大,其实内涵有云泥之别。

中国人一直骄傲地认为,在我们都进化完成之后,欧洲人依然蹲在树上没下来呢。分子人类学告诉我们的信息完全相反,东亚人的支系O型Y染色体几乎是最晚“诞生”的一个支系。本来“诞生”早晚也无所谓,但很明显,新科技正在颠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傲慢心态。中国人本土起源论在大约2006年前后中国体制内学者也不得不开始半推半就地接受这一全球新理念。而与之同构的文明起源恐怕也要接受同样的转变,但我们的学者似乎尚未做好这一准备。

国际著名考古学家保罗·G·巴恩批评中国人把考古当作一种“增强民族认

同感”的工具^①。巴恩也指出：被殖民国家由于现代的落后，他们想在辉煌的历史中寻找能使自己翻身的机会。一定程度我上可以理解中国广泛存在的民族情绪，但在包括文明起源等一系列历史研究中存在的明显问题，这些认识上的失误假如不得到纠正，都会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那些看似很损害中国人自信心的研究，将其掩盖起来难道不行吗？我认为讳病忌医不仅不科学，而且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不诚实行为还是可耻的。假如不及早指出这一点，对于中国社会隐蔽的危害会持续更久、更深远。我们都知道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借鉴，假如不能以求真为基础，那么“以史为鉴”将是一句空话。20世纪中期开始，“诚实史学”在全球发达社会基本都不再是问题，只有在落后地区才是问题，它本身就是检验一个社会是否先进开明的指标之一。

同时，我也乐观地认为，我的研究其实也是在中国人自信心高度增长的前提下的结果。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崛起”已是事实，在这个前提之下严肃客观的科学批评才可以得到中国社会有效的支撑。在20世纪这件事情是不可想象的。尽管我的研究受到了许多荒谬的阻碍，但最终也说明了进步。总体上我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并非完全是一句空话，这意味着中国可能在本世纪经历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而转变是否顺利，其前提就是中国人是否能够开始科学、理性、精确地认识与衡量自身所面临问题的大小，而在之前的文明认知体系上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新时代必须有新的文明史呈现。

或许我的研究还有另外一个用心，我认为中国人对于“崛起”的期望过高，也是到了该被人泼泼冷水的时候了，这样发展更稳健，更健康。我对于中国文明的重新定位，就是这样一盆善意的冷水。我认为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一个阶段之后，需要进入一个新的耐心细致的调整阶段。

下篇 谈点“学术”问题

一、直视文明起源争议

客观地讲，目前全世界都承认世界文明是各地独立起源，其中原因复杂。考

^① [英] 保罗·G·巴恩主编，郭小凌、王晓秦译，《剑桥插图考古史》，第34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

古学与历史学从来是一门“政治学”，它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紧密相连。并且，全球文明同源也从来没有真正稳定地确立过，因为考古学本身也在发展之中。从近二三百年的考古发展史看，任何落后国家的历史都是国家统治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我们也发现，只要一个地方解决了基本温饱进入现代化社会，这种考古学对国家的依附性就会减弱，之后史学才能进入相对客观的科学阶段。西方社会是在“二战”后，才进入相对理想的考古状态的。

今天中国的考古可能依然处于民族情绪高涨的非常时期，相当于100年前西方考古面临的社会状态。在《考古学思想史》^①（148页）中，作者崔格尔也暗示中国的考古学是“国家主义历史学”，其作用在于“鼓励国家或民族的自豪感和士气”。

在我看来，各地文明独立起源的现状是荒谬的，而且中国知识界要为此承担一定的责任。原因是，本来100多年前全球文明同源的理论有一个苗头出现，甚至“西来说”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曾经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在“文革”期间中国由于此前在殷墟等处的重要发现，中国考古人不仅推翻了西方对于“中国文明源头”仅只始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的看法，当时的中国人在封闭环境下乘胜追击，还确定了“中国文明”向前推到商中晚期。这些都是正确的。但之后就开始走火入魔，认为中国文明起源应该更为久远，进而“中国文明为独立起源”顺理成章地成为定论。直到今天，中国历史界与考古人继承了这笔“文革”精神遗产，从未对这个影响重大的学术活动进行过深刻的反思与反省。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更可谓是对这笔遗产的继续发扬光大，继续强化了“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所以，中国考古界假如说不是全球各地文明独立起源的始作俑者，起码是强化者。

中国科学界整体落后于西方几十年，一般中国人唯西方马首是瞻，但为何在“文明起源”这一领域内中国考古界似乎可以独断？原因在于：（一）中国太大了，其面积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中国之“大”在多方面误导了人们的基本判断，比如历史时期中国长期以其之“大”使人误认其文明之高（参见拙著《文明大趋势》）。同样，在考古领域内，一个中国之大，就可以“一手遮天”。（二）假如说全球文明为同源关系，那么就必须在全球有一个完整的传播链，而中国这一环恰好处于正中间，而且它那么大、地位如此重要，位于西亚、中亚与美洲之

^① [美] 布鲁斯·崔格尔著，徐坚译，岳麓书社，2008年。

间，假如中国地区否认全球同源，则整条链环彻底断掉，那么全球势必要接受各地文明独立起源。（三）中国人急于证明自身文明的伟大与独特，所以愈发强调自我文明独立起源论。之后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失去国际视野的矫正，中国史学界越来越走向民族史观。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容许西方学者进入中国，但进入者多是有爱国情结的华裔学者，他们可能本来就是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支持者。独立起源有了“国际”的加冕，所以，文明起源问题愈加走入死胡同。

由于语言翻译的障碍，国际考古界除了认识到中国史学界的民族主义倾向外，实际上也无能为力。直到今天，这个局面并未有太大的改观。所以，再次审视我这个学外语的中国人的行为，似乎有些问题就有了答案。中国的外语系人，是一道接通中西方两个不同世界间的桥梁。

二、全球相关知识与技术的成熟是根本原因

（一）世界史给我们的启发

简单地回顾一下全球史与考古史的出现，可能对于理解我的研究会比较有利。

人类拥有成熟的全球视野或整合全球观的欲望，仅只是近几百年的事情。人们在统一了地理、时间条件之后，再将之缝补起来连贯为一种“全球发展史”，才只有不过大约 100 年的时间。从今天看汤因比（1889—1975）的时代及其所做的工作，也只算开了个头。

汤氏在 1945 年“环境挑战论”的分析，只是一种对世界相对分割的集合，所以名为《历史研究》，反映了一种在这个领域的试探心态，但这本书在当时看来是一种高度创新，引起了全球欢呼。假如我们把“全球史”看作一种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探索的话，或许时间应该再推前一些，比如德国学者斯宾格勒（1880—1936）的《西方的没落》，甚至再早些的韦伯（1864—1920）的一些社会学著作，都涉及了这些话题。在这同时也有美国人试探更为完整全面的叙述，如海斯、穆思与韦兰三人合写的《世界史》——好的世界史几乎都是合写的，因为难度太大，涉及广泛。中国学界在 1946 年尚无能力写出这样的著作，但却出版了《世界史》的译本。这些都是第一批探索全球文明史的学术努力。

这也似乎是个规律：能够涉及或解决这些全球史问题的前沿学者，都出现于当时的最发达国家。所以，全球史的书写乃至一般的历史研究水平，都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一个地区的文明发展水平。

中国至今也没有像样的世界史著作出现，说明了中国人认识世界本身就存在着问题。顺便在这里说到一个不算是题外话的话题：在中国学界，中国史是单独设立的，它分裂于“世界史”之外，造成了懂中国史者不懂世界史，懂世界史的不懂中国史的严重局面，并且在更具体的考古界恐怕都不涉及西方考古。这种明显存在缺陷的史学教育研究结构，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最大技术性障碍与深层原因；其明显的荒谬之处还在于，中国考古学者在推论中国文明独立起源时，根本不做充分的全球的文明起源对比^①，即无比较参照的前提下就单方面宣布自己的文明是独立起源。又由于“文明独立起源”在中国大陆的政治正确性，所以，一般学者即便不是研究文明起源的学者，或者根本没有对外部世界进行比对，也常常在自己的著作里强调一下中国文明是独立起源，以显示自己的“爱国情怀”，这就更加强化了一般国人的独立起源观。近几十年也根本没有人来证明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影响，“文革”前后即使零星有一些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著作进入中国，也多是作为批判资料出现的。直到今天，很多历史名著进入中国尽管不再打着“批判”的名义，但却在翻译之前就把有关中国的部分给删除甚至修改却是常事。因而，中国读者在这样的阅读环境下，如何形成有别于国际的一套特殊世界观与历史观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中国人在文明起源问题上的民族情绪，其研究有多荒谬几乎不用推测。总体这些浅显而荒谬的问题，实际上都不仅是中国史学科学落后的表现，也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整体愚昧落后的表现。

全球史的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首先兴起于美国，然后扩展到世界各国。中国人最熟悉的世界文明史，是希腊裔加拿大籍的左派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于1970年出版的《全球通史》，一个“通”字，说明了无所不包，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本“全球通史”。

总体看，世界史是一门非常不成熟，或曰正在飞速成长的科学。这种状况与考古学领域，与文明起源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

“全球史”已属新领域，而全球史著作中牵涉文明起源的“史前史”部分，更像是近年来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新东西。比如西亚的楔形文字，中国的甲骨文乃至西亚、希腊的诸多古代文化遗址，都是近一两百年来才逐渐被人们通过考古

^① 可参见朱乃诚著《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无论从目录还是在参考书目中都看不到西方研究的对比痕迹，说明了在此之前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是一个真正封闭的“中国制造”。我个人希望以后这个情况能有明显的改观以取信于国际知识界，因为中国仅只是地球的一个组成部分，理应把中国放进世界去考察其起源。